

招生乱象折射民办高校“以生养校”困局

核心提示

全省高招工作尚未开始,学校已向考生收取了近万元费用;招生老师早早承诺的“统招”,到校后却成了自考生……“十一”长假结束,今年高招最后一批的高职高专生正式走进大学校门。但在福建省,两所民办高校却因在高职招生中的违规行为遭到查处。

记者调查发现,尽管教育主管部门三令五申,但在民办高校生源争夺战中,“不实宣传、虚假承诺”以及“先上车、后买票”的违规招生行为并不鲜见。在“学生奔前程、学校奔‘钱’程”的矛盾背后,民办高校“以生养校”的发展困局清晰可辨。

“统招”竟成自考生

福建省三明市考生崔盈凯今年的高考成绩不理想,但早在7月上旬,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驻三明市的招生老师就给他带来了好消息:可以通过补录将其招为统招生。

补录是福建省2008年高招的一项新政

策,在新生入学报到后,招生部门根据各校新生入学情况,将一些放弃入学的考生计划集中起来,再次向社会公布,由愿意报考高职高专的考生再次填报志愿,相关工作在9月20日后开展。

“招生老师说在三明市的补录指标只有5个,要想上就要尽早定下来。”崔盈凯的母亲林丽玉说,招生老师一再承诺:“保证是统招,到时不是统招全额退款。”为了取信考生及家长,招生老师还专门组织了多名三明市考生到厦门市华天校区实地考察。

7月14日,2008年度福建省高招录取工作尚未开始,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向崔盈凯收取了近万元的费用。学校开具的收费收据显示,学杂费为7300元,加上住宿费、教材费等,所有费用共9460元。

9月28日,福建省2008年高招补录工作结束。9月30日,崔盈凯“如期”收到了华天寄来的“录取通知书”:他被该校机电系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正式录取,学制三年。一同寄达的还有三份贺信,上写:亲爱的同学,祝贺你被我院国家计划内统招录取。记者注意到,“国家计划内统招”还特别以红字标注,但贺信中却没有写上被录取考生的姓名。

林丽玉告诉记者,所谓的录取通知书是华天用于招收自考生的,同时附上一份不写考生

姓名的贺信让人误以为是统招生。“农村家庭凑一万元的费用不容易,就是想让孩子有大学有个好前程,没想到原来是自考生,我们将被骗得太苦了。”遭遇同样经历的学生家长陈桂姬说。

为“钱”程民办高校大办自考生

无独有偶,福建泉州的一所民办高校也在今年高招中出现了同样问题。福建省教育厅提供的材料称:今年9月间,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对外承诺不需经省高招办正式录取,不需要《入学通知书》,可提前入学。考生只要在补录时,将该校填为第一志愿即可。当全省补录工作结束后,100多个提前办理入校注册手续的考生无法被录取,家长们开始向学校讨说法。

据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办副主任孙海洪介绍,该校要求退学的有六七十人,而愿以自考生身份入读的有100多人。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执行院长汤秀奎表示,目前学校已经开除了两名涉嫌违规的招生老师。

汤秀奎说,按往常经验,补录阶段分数线一般比第一批录取时低不少,甚至出现报名人数少于补录名额的情况,补录时成功率很高,

这是造成部分招生老师作出“补录成统招”承诺的一大原因。但今年福建省考生人数创新高,补录竞争非常激烈,许多考生没有补录成功。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相关人士也表示,提前招生是“根据往年录取经验,参照其他民办学校的做法”,但今年招生形势变化太大,以致部分考生无法补录成功。

“招生老师一开始就是精心策划,先用统招生的钩子,录不了就将你变成自考生,到时你想再找门路都来不及了。”在林丽玉看来,此次招生违规并非一时失误,而是蓄意为之,“因为省招办的补录结果出来后他们还在欺骗考生。”

记者调查发现,因为统招招生数量按计划控制,不少民办高校普遍热衷开办自学考试助学班,俗称“小自考”,这已经成为民办高校生源争夺的“主战场”之一,不少招生违规行为都因之而起。福建省自学考试办公室主任陈明庆介绍说,自学考试班属于非学历教育,其招生数量不受限制,入学门槛很低。

根据福建省物价局规定,公办高校每名自考生一学年收费不超过2640元,而民办高校自考生的收费标准是公办高校的2~3倍。2007年福建省全日制在校自考生有3万多人,民办高校和公办高校各占一半,但公办高校办自考班的积极性逐渐下降。2008年福建省高招录取率在60%左右,大约有12万名考生落榜,这些考生成了民办高校自考班的争夺对象。

记者了解到,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的8000多名在校生中,自考生就有3000人左右,学校不得不租用一校区用于容纳自考生。



资料图片

校不堪重负。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全校588名教职员中,招生人员就有110名之多,每年四五月份开始,该校就派省内派出大量人员设点招生,涉及省市达16个之多。

“羊毛出在羊身上”,高涨的招生成本最终要由学费来埋单。厦门一家高职院校学生告诉记者,今年暑假他在本校招生老师的“领导”下,回老家去招生,并顺利招到了两名自考生。“招一个可以拿七八百元的报酬,招生老师比我们拿得多。”

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院长丁国强介绍,因为缺乏财政支持,民办高校的经费来源一是靠股东自掏腰包,二靠银行贷款,三靠学费收入。在股东自有资金投入不足、银行贷款有限的前提下,学费收入成了民办高校最为稳定的资金来源,因此招生工作也就成了民办高校的生命线。

“我搞了一辈子的教育,你说我喜欢去搞坑蒙拐骗吗?”汤秀奎告诉记者,民办高校要想发展壮大,“钱”是最大的瓶颈之一,其中的坎坷与艰难很少有人知晓。

据介绍,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的投资者将7000万元的自有资金投入办学,经过6年的快速扩张,目前已发展成占地500余亩、建筑面积10万多平方米、在校生8000多人的规模。学校在银行贷款有9000多万元,几个重大基建项目正在进行中,资金链已十分紧张。汤秀奎说,投资者已经为办学倾注了大量的资金和精力,个人很难再为学校输入大笔办学资金。

吴仁华表示,囿于资金压力,大多数民办学校的发展主要还是依靠规模扩张、收费办学、低水平运作,从而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随着考生数量的逐年减少和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民办高校也将逐渐完成从补偿性教育到选择性教育的功能转变,‘以生养校’模式难以持久,一些不注重品牌、特色和教学质量的民办高校注定要被淘汰。”

据新华社

银行卡全面收费 在质疑中执意推进

核心提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日前开始对银行卡、活期一本通存折异地存取、转账等收取手续费。与此同时,建行开始收取短信服务费后,交通银行对信用卡的短信通知服务开收服务费。

银行卡进入“全面收费”时代?

上海浦发银行被认为是国内最后一项提供跨地区存取款免费服务的全国性银行。10月8日起,原本免费的银行卡、活期一本通存折异地存取、转账(汇款)业务中的8项服务均开收手续费。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仅有民生、兴业和华夏3家银行暂时对同城ATM跨行取现仍提供免费服务。而其他银行卡有关的收费项目从一般借记卡工本费、年费、异地存取款费用,到信用卡账户余额变动的短信通知、刷卡交易短信通知等服务性费用,都先

后从免费逐渐变成了收费。而多数收费都是在消费者不知不觉中开始的。

“国际惯例”还是“商业利益”?

为何对银行卡开始广泛收费?接受采访的四家商业银行有关负责人回答基本一致:一方面为提高经营效率为客户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一方面是业务转型。

国内14家上市银行公布的2008年上半年财务报表显示,银行卡手续费占中间业务收入20%至30%。由此看来银行热衷于收取服务费背后的商业利益驱动是不言而喻的。

记者了解到,自2005年各大商业银行开始收取的小额存款账户管理费,银行援引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国际惯例”。事实上,据湖南当地的金融监管部门介绍,国外银行主要是对支票账户存款收取账户管理费,而对定期存单(功能基本相当于我国定期储蓄存款)和储蓄账户(功能基本相当于我国活期储蓄存款)则不予收费。

谁来监管银行卡收费?

“如果银行一定要收费,那么该收多少?哪些该收哪些不该收?”湖南银监局就此进行调研后认为,银行对小额存款账户收取管理费虽有据可依,但在收费范围确定、定价方式、操作管理上却有不合理、不规范的地方。比如,各银行小额账户管理费标准就不一致。

“向银行贷款要交利息,这我们能理解。但公众在银行存钱,银行已从利差中赚取了利润,为何还要收年费、管理费,这就在情理上难说通。”长沙市民王军说。

专家认为,银行作为特殊的金融企业,在我国经济转型期扮演着特殊的角色,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担负着调节经济和向社会提供公共品服务的职能,因此对商业银行业务更大程度上应界定为“重要公益性服务”,进一步明确商业银行自主定价权的范围,并对其收费进行严格成本审计和监管。

据《新华每日电讯》

“以生养校”托不起民办高校的明天

“不管有什么理由,这种‘先上车,后买票’的招生行为都是严重违规。”福建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吴仁华说,为此,福建省教育厅在9月11日就特别发出通知,严禁院校在未经生源地省级招办正式办理录取(含补录取)手续之前,擅自招收落榜考生进校“跟读”。

违规招生为的是多招生,多招生为的是广开财路,破解办学资金短缺难题。福建省一家高职院校的负责人表示,招生乱象使民办高校陷入恶性循环而难以自拔;违规招生损坏了学校声誉,只好投入更多人力、用更高的成本招生。招生人员庞杂,不计后果争夺生源,学校的声誉一再受损。“生存是第一要务,没有生源什么都不用谈,民办高校也有无奈之处。”这位负责人说。

激烈的生源争夺让招生成本不断推高,学

新闻时评

中外媒体竞争中 采访限制放宽

10月17日,国务院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新条例的实施意味着,只要得到被采访者同意,外国记者无需再经政府部门审批就可以采访了。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表示,体现了中国坚定不移地坚持对外开放方针。这句话说得对,但不够全面,应该加上非常重要的一条:体现了国家自信心的空前提高。自信心的来源除了经济高速发展而来的政治自信心外,也跟中国媒体的发展有关。

看看外媒怎么说中国,曾经很时髦,《参考消息》的新闻出口转内销有点像短缺经济时代的“友谊商店”。商品未必有多好,关键是可以缓解(信息)短缺问题,受众饥不择食也在情理之中。在中国无法掌握新闻报道的国际话语权的情况下,要想改变自己在新闻报道中的被动局面,最具操作性的办法无疑是源头上控制新闻的报道范围、地域、领域,1990年制订并实施的外国记者管理条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

也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新闻事业进入了一个爆炸性发展的阶段。毫不夸张地说,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新闻采访的一个个禁区逐步突破的过程,而公众的信息短缺问题也同时得到了有效解决。

事实上,无论是对民生的关注、对政治清明的追问,还是对国家发展轨迹的探寻,国内媒体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政治社会生活的“第一参考”。外媒因为政策原因而获得的猛料越来越少,比快,比辛苦,比采访资源的丰富,比思考观察深度,而不是比谁受的管制少,将越来越成为中外媒体新闻较量中的焦点。

当然,“放宽”意味着更大的自由及更丰富的新闻报道可能性。我乐于看到在中外媒体的相互交锋中,中国公众享受到更多更好的新闻产品。“大国时代”的大国不仅有大国国民,还要有大媒体,真正的大媒体走出国门也能顶天立地。今天向世界发出强烈“中国声音”的中国媒体,有没有信心明天发出中国制造的“世界声音”?

高永峰

草根版百家讲坛让话语权多元

连续两次被《百家讲坛》拒之门外后,北京青年韩江雪自己掏钱拍摄了一部6小时的视频《从靖康耻到风波亭》放到新浪播客(视频分享),挑战《百家讲坛》(《新京报》10月21日)。

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韩江雪事件发生后,就有论者指出,此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百家讲坛》的话语权始终掌握在极少数专家学者手中,坊间就算对其不认同,也找不到表达与交流的机会,因此酿成掌掴事件。

韩江雪的草根版《百家讲坛》以播客的方式出现,就意味着在诉求无门

的背景之下,一些民间的文化人士已经开始寻找另外的表达方式。相比于央视的《百家讲坛》,或许韩江雪的视频影响有限,但毕竟,韩江雪们已经开始主动进行意见表达。

显然,这种由被动到主动的转变,是坊间文化人士重视话语权的一个必然。在一个人人都需要表达的年代,并非谁的声音大,就意味着谁有理;并非谁是专家,就注定拥有话语权,“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对于文化,不同之人自有不同看法。这是个人人都在争夺话语权的时

代,倘若专家学者的表达频频出错或不被公众认可,那么来自坊间的草根人士理所应当承担起为专家学者纠偏的重任。草根版《百家讲坛》的涌现并受到网络追捧,已经证明公众不仅需要单一专家学者化的《百家讲坛》,更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特别是坊间的有识之见。

对文化的传播,声音本该多元,公众本来也该有更多的选择权。从这个层面看,草根版《百家讲坛》的出现,受益的自然是广大的受众群体。

萧 葱

称病不归国的书记 是不是裸官

据10月21日《南方都市报》报道,今年“十一”长假之后,浙江省温州市委常委、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并未按时到办公室上班,他在法国考察时称病未能按时归来。知情人士称,温州市委正在派人前去看望这位省管干部。

一位副厅级的领导干部出国考察却未能按时回国,这已经给人们提供多么大的遐想空间啊!或许是我等小百姓的“小人之心”,杨书记的考察“走丢”,居然让我的脑海中浮现出福建省原工商局局长周金伙、中国银行黑龙江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等,因为“杨湘洪法国考察称病不归”报道中的蛛丝马迹已经告诉人们,这位杨书记也疑似“裸官”,最起码是“半裸官”。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企业家向记者证实,杨湘洪带考察团到巴黎考察两天后,以探望其在法国已经成家的女儿为由,独自离队”,很清晰的是,杨书记的千金已在那边成家,至于他的妻子,报道中没有提及,自然不能不加揣测,但“半裸”却是很确凿了。

“全裸”也好,“半裸”也罢,无非是“裸官”裸露的程度而已,而如果有关部门不留神,“半裸”的问题官员也会迅速变成“全裸”而加入到外逃官员的行列之中。自从陕西首任落马的副省长高官——原省政协副主席鹿宪钜事发后,“裸官”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之一,而在“人声鼎沸”的清议之中,不知道,又有多少“裸官”在加快“走丢”或是不归的步伐,不知道,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算不算其中的一个?

我们真的拿“裸官”束手无策吗?显然不是,领导干部的亲属出国留学或定居,都是在有关部门办理手续后才能成行的。所以在“裸体做官”愈演愈烈的今天,对领导干部亲属留学或定居进行必要而严格的审核,纪检机构应该有所作为,并且应该是领导干部管理和监督中一个日益紧迫的严峻课题。如果能像中纪委出台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规定一样,对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出国留学或定居出台严格的考察审核制度,比如官员的亲属如要出国,都要先经过上一级纪检机构审核,应申报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出国费用来源等情况,而对于那些配偶、子女已经出国的“全裸”官员或是“半裸”官员,纪检机构更应严加监督,正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否则,问题官员前“裸”后继续更加“蔚然成风”。

法国考察“走丢”的杨书记的问题最终肯定能水落石出,但如何防范那些官员成为“裸官”并莫名、轻易“走丢”、不归,杨书记事件,是不是又一次警醒有关部门不应该无动于衷了?

吴杭民

为何又是中药注射液惹祸

日前,卫生部召开紧急电视电话会议通报,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医院使用山西太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茵栀黄注射液后,有4名新生儿发生不良反应,其中1名新生儿死亡。经调查,该企业共生产茵栀黄注射液26万支,已全部销往河北、山西、吉林、黑龙江、山东、云南、陕西和宁夏回族自治区8省(区)。卫生部要求各地立即停止该批号茵栀黄注射液的临床使用。

11月到2006年2月,国家药品不良

反应监测中心共发布10期《药品不良反应信息通报》,10种中成药因发生不良反应被通报,其中,中药注射剂有7种。尽管不良反应比例较高,但近几年来,中药注射剂生产厂家的积极性却空前高涨,这究竟是为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负责人曾对记者直言:“因体制制约注射剂,算是新剂型的申报,可以重新定价。而且,注射液是在医院强制用药,用量更大。相比之下,比口

服药的利润空间更大。

一切都水落石出,无非是“利益”两字——为了能重新定价,为了能扩大盈利空间。生产厂家谋利,一点也不足为怪,哪个办企业、搞产品不想赚钱?可是,用药安全和经济利益孰轻孰重?既然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比例这么高,既然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都掌握了这方面的数据信息,职能部门的监管,为何不见严格把关?生产的准入门

槛,因何不见抬高?

于是,中药注射剂领域就不知不觉地步入了这样的怪圈:一方面,药企因追逐经济利益,纷纷投入中药注射液生产;另一方面,职能部门疏于监管,事故自然不断。“完达山”事件尚未完结,“茵栀黄”又惊悸夺命,谁又来保障人民群众的用药安全?在一些职能部门的心目中,用药安全和利益牵扯,到底孰轻孰重?

朱 民